

25701

西安文史資料

第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
西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耀县起义

-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建立经过……………王 英 (1)

丰功伟绩 永垂青史

- 忆西北红军领导人之一王太吉烈士……………张秀山 (16)
- 回忆王太吉同志……………张邦英 (26)
- 怀念革命烈士王太吉同志……………赵起民 (32)
-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撤回延安……………谭 冰 (38)
- 八年交通联络和情报传递工作的回忆……………张仲平 (44)
- 胡景翼将军在“北京政变”前后……………马文彦遗稿 (68)
- 胡景翼渭北蒙难与李天佐之死……………窦荫三 (75)
- 回忆“四·一二”我在黄埔军校被捕入狱
的见闻……………郑自毅 (79)
- 杨虎城将军后期的军事活动及其部队建制
的变更……………李紫山 (83)
- 十七路总指挥部军事组织变化情况 (摘抄) …… (102)
- 西安绥靖公署

胡宗南控制下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	刘钊铭(107)
旧西安文化界的魔影	
——记胡宗南系统的几种刊物和	
两个出版单位·····	徐国馨(127)
西安警察局见闻·····	李 强(134)
西安教育史的重要篇章	
——纪私立成德中学——中山中学	
——省立二中(下)·····	田克恭(148)
西北农学院的创建和陕西水利的兴起·····	马文彦遗稿(166)
西北妇女职业互助社始末·····	李志清(172)
盐制概略·····	阎馨远 张志修(179)
大兴善寺·····	康寄遥遗稿(188)
西安南大街·····	田克恭(197)

耀 县 起 义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建立经过

王 英

(一)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南侵，敌焰方张，山河日蹙。全国各族人民对蒋介石集团的投降卖国罪行，无不义愤填膺。各界进步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和领导下，掀起了持续的抗日救亡风暴。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前途，已面临最后关头，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成为每个政治集团和每个武装力量必须考虑的现实课题。

驻守在陕西耀县的西安绥靖公署所属的骑兵团，同样面临着这个抉择：起义抗日，还是作人鹰犬继续与红军为敌。

骑兵团的团长是王太吉。这个团成立于一九三一年，开始时叫“新兵训练处”，先驻在西安西关大操场，后来移到城内东北角，开始修建兵营、马厩。西安绥靖公署把甘军苏雨生骑兵团的几百匹马拨来以后，才改名为骑兵团。一九三二年春，杨虎城派宪兵给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送去大部分马匹，留给骑兵团的不过百余匹。骑兵团除设军需、军医、副官、书记四处外，下辖四个连和一个直属通讯排，共约千余人。这支部队成分复杂，地域

观念浓厚，进步与落后的矛盾相当突出。

骑兵团中相当一部分革命力量，深感民族危难，力图摆脱现状，为抗日救亡作出贡献。他们曾先后发动过两次起义。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二年冬季，第一连连长魏志坚（中共党员）在商南领导全连起义，准备和红四方面军汇合。由于警惕性不高，部署不周和地形不熟，在起义后被本连反动班长蒲章成乘魏不备时枪杀，部队随之瓦解，仅有少部士兵被蒲带回骑兵团（蒲在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逮捕判刑）。第二次是第二连连长刘清和准备起义，想把全连带往嵯峨山与红军游击队苗家祥汇合，不幸事泄，起义失败，刘只身逃往游击队，当了政治委员，后被叛徒出卖牺牲。

当时中共党员在骑兵团进行地下工作的团部副官袁宏化，排长赵启民，均因被国民党发觉离开部队，仅有护士聂××、秦重民、陈守印，以及一连四排班长王振民（即王英）留在部队，秘密进行军运工作。聂、陈、秦三人在起义前亦先后离队。

王振民当骑兵团移防三原后，接受赵伯平（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习仲勋（中共三原中心县团委书记）等同志的指示，积极组织第四排起义。在准备工作上，采取了四项措施：（1）在政治上，对四排全体士兵晓以抗日大义，启发其阶级觉悟，在军事上，加紧练兵整顿，用谎报军情多报消耗多领子弹，充实军械，以备起义；（2）成立“红军之友社”，秘密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对俘虏的政策等；（3）调查部队的装备，军官的思想情况和机密军情，随时向党派来的接头人报告；（4）把节余的子弹送给渭北游击队黄子祥部，由秦重民等人在城外接收，同时掩护地下党员携带文件出入三原县城。

当上述工作已取得一定效果，习仲勋同志已经把起义路线图交给王振民，骑兵团四排起义即将爆发的时候，中共三原县中心县委，鉴于甘肃“两当起义”一个营全部失败的教训，认为组织一个排的起义作用不大。习仲勋同志当即告诉王振民，叫他继续潜伏该团工作，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一指示，为后来王太吉起义及时取得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给民众以自由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之下，准备同任何国民党部队订立共同抗日协定的宣言。这时，日寇已陷热河，长城各口相继告警。同年五月，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成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日的军事形势为之一振。

骑兵团这时已移驻耀县。王太吉得悉以上情况并听说同他熟悉的杨晓初、张性初、师守命（以上均是中共党员）、杨可均（拥护我党抗日主张者）等都去张家口时，不禁热血沸腾，急于有所举动。他向何寓础说：“人家都动起来了，我们还能坐着不动！”但他当时的处境有困难，思想上也有矛盾。一方面，他很清楚，在杨虎城部队他是不被信任的。杨的参谋长王一山知道他曾经在麟游县率部起义过，又参加过渭（南）华（县）起义，所以对杨虎城说：“太吉年轻（当时二十七岁）不可靠，在本军时间短，不可重用”。同时杨部的旧军官对他当团长也表示不满，旅长唐子封常说“杨受共产党包围”，其中就暗示有他。另一方面，骑兵团有党的组织活动，官兵的抗日情绪逐渐高涨，对红军的好感也与日俱增。如周得民曾参加王太吉一九二八年领导的“麟游起义”。起义失败后到国民党公秉藩师当连长，在战斗中被我江西中央红军击伤被俘，经教育释放后到王太吉骑兵团当

副官，他宣传红军作战勇敢，优待俘虏等情况。该团不但曾先后发生过两个连的起义事件①，尤其在不久前，由于第四连的一个排在防守三原县武子区侯家堡子时，被红二团和渭北游击队诱出全歼，因而受到西安绥署的严厉责斥。他在困境中同党失掉了联系，就象孩子失掉了娘，心情非常苦闷。

王太吉于一九二四年由中国共产党选送到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并于同年入党。一九二七年任陕军第三师学兵营长。一九二八年春率全营在陕西省麟游起义，成立红军游击队。同年五月十六日参加“渭华起义”，成立西北工农红军革命军，王太吉任参谋长。渭华起义失败，王太吉失掉了党的关系，被国民党逮捕管押南京。敌人对他威胁利诱，毫未屈服。他在监狱留下豪迈诗句：“南京被押已年，蚤虱围攻何足怜，翻身消灭尔五类，革命精神炼愈坚”。后被杨虎城保释出狱。杨以太吉骁勇善战，博学有才，任太吉为十七师补充二旅副旅长。1930年调任新兵训练处处长，后改为骑兵团，太吉任团长。

王太吉毕竟受过党的教育，参加过多次革命斗争，他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救中国。他决心主动争取党的领导，依靠进步力量，团结中间力量，举行全团起义，在西北开展新的抗日局面，呼应东北义勇军和察绥抗日同盟军。

(二)

为了取得党的领导，王太吉找他的老同学何寓础（三原省立中学校教务主任），请他作为代表去找中共陕西省委。何找到了中共党员李赋言，请他把情况转告省委。省委当时就派余海丰同何寓础联系，余听了何的汇报，说：“这太好了，最近红军在秦岭失利，要是王太吉的骑兵团真能起义，在政治上、军事上对

革命都有利。我去报告省委，研究后就来告诉你。”过了几天，余来对何说“省委欢迎太吉起义，而且决定领导这一起义，但事先须和太吉本人接头，具体研究，作好准备。你既然代表太吉，那咱们俩就一块到耀县去一趟。”何、余两人于六月中旬赴耀县，第一天到三原，夜宿周芝轩（中共党员）家，谈了些有关骑兵团内部的情况。第二天到了耀县，就住在团部（伪县府内），王太吉同余海丰见了面，接上了关系。

一天下午，王太吉邀何、余两人去城外郊游，走到菜地的一个水井旁，三人在一个葡萄架底下坐了下来。王太吉把骑兵团内部和耀县的军政情况作了介绍和说明，再度表达了他的起义决心。余海丰代表省委表示欢迎太吉起义，并就全国和陕西的当前形势作了分析。经过三个人的讨论研究，作出了几项决定：

一、起义后的部队名称叫“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

“第三路”的叫法，系根据王太吉的补充意见作出的。他认为，增加“第三路”三个字，人们会联想至少还有第一、第二两路。这可以迷惑敌人，鼓舞群众。再则，他和杨虎城部下交情好的军官还有几个人（如杨部团长严云生），在他打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旗号以后，这些人当中，可能有人因被怀疑而有变化或有所举动（王太吉起义后严云生神经失常私离队伍）。

二、起义后，在耀县行动三天。收缴地方武装。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起义，散发宣言、布告、传单等，进行革命宣传。打击一些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如左善楚等。必须注意部队纪律，不得扰害群众。

三、三天以后，部队即向白水、澄城一带活动，因为那里党的基础好，必要时可进入黄龙山。在进军到达目的地后可逐步改

造部队，由当地党组织输送一批党员和革命群众，或由部队吸收一部分农村积极分子，以充实部队实力。

四、省委另派人来领导起义，起义后的部队政治工作，由省委派人成立政治部。起义的具体时间，不预先确定，等省委派来领导起义的同志到来之后，再同太吉视情况决定。准备工作要快，事不宜迟，迟了恐有泄露。

回到团部，王太吉还邀请何寓础、余海丰参加了一次骑兵团的军官会议，并都在会上讲了话，会后、何、余两人返回西安。

骑兵团的起义确定之后，王太吉就秘密召集比较进步的青年三、四个人，和他们谈论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王振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感到诧异，便着相好的进步青年试探底细。王太吉和这些青年作过几次谈话后，要他们联络更多的青年。王振民便两次去见王太吉，谈了一些东北抗日义勇军作战如何英勇，关内应该如何支援，以及本团青年都愿抗日救国等……。王振民还借故闯进密室，看到了预制的义勇军红旗等，他才相信王太吉确在准备起义。于是，他第三次去见王太吉，见面后即开门见山地说自己就是中共党员。王太吉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对王振民笑着说：“我真没想到你会是共产党员！你隐蔽得真好，我都没有看出来，咱家又有人干革命了（太吉和振民系叔侄关系）。既然你是共产党员，我就先把计划给你简单的说一下。”接着他又说：“我不问你咱团有多少党员，只要他们愿意抗日，不论老少都行；青年人当然要更多联络些，抗日就是要靠这些青年人嘛！”王振民于是广泛联系进步青年，继续在部队中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了解、监视反动军官的活动。王太吉命令加紧在密室制作起义用的旗帜和印信、宣传品等。并派出侦察人员分两路去蒲

城、白水、韩城、宜君、洛川等县侦察地形和敌情，又派人到耀县附近调查土豪劣绅的住址和恶迹。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中，不料发生了一起不愉快的事：六月下旬，王太吉亲自到西安见杨虎城，领到了一笔军饷和新的驳壳枪，并买回大量雨具（以备起义后使用）。在他返回耀县途中，误被我“渭北游击队”在石桥伏击，损失战马两匹，手提机关枪两支。王太吉幸以身免。石桥战斗发生后，中共陕西省委以为在这一事件上，王太吉定会不满，于是犹豫不决，迟迟不派代表来骑兵团接洽。

王太吉起义心切，对石桥事件知系误会，并不介意，他焦急地找王振民，商议如何尽快地取得党的领导和如何请红军配合的问题。王振民因为和他接头的秦重民好久未来，骑兵团起义准备情况和要求也无法报告省委。他想了一会儿便建议：“我知道三原县新、武区有‘渭北游击队’，不妨去联系一下，看是否可以接上关系。”王太吉表示同意。王振民换上便服就前赴三原，到了陵前，碰到伪装割草农民的游击队员卞德荣（一九三六年阵亡于富县道德原）等二人，王振民对他们说，游击队里有他的亲戚，想去那里探望一下。卞德荣怀疑王振民是白军骑兵团的侦探，就假说他知道个大概的地方。王早看出他们是游击队的便衣，于是便随他同行。两人一前一后，王夹在中间。走到干涝池村西头下了沟，经过崎岖的羊肠小路，进到沟底一个被水冲刷出的黑洞中。在洞里，王看见有杜衡（原省委常委后叛党）、杨声（刘映胜，红二十六军四团政委）、黄子祥（红二十六军四团团长）、杨玉亭（团部经济员）、屈继君（少先队员）、李志伯（分队长）等。杜衡根据卞德荣等的报告，也怀疑王振民是密

探，对王反复盘诘，并用枪威胁，令拉出几次声言要枪毙，王不为所动。杨玉亭伪装从中劝阻。王详述他给游击队捐送子弹等情，并经李志伯证明后，他们才消除了怀疑。当晚，杜衡派游击队员送王振民和省委代表杨声到了耀县。杨声会见了王太吉，确定了起义的一切事宜。

王太吉召开了连排长和有进步青年参加的两次机密会议，布置了收缴胡景铨民团等敌伪武装的问题，并划分了地区。规定起义时间为中午十二时，只等吃饭号一吹，便统一行动。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②，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中午十二时，骑兵团驻地号声嘹亮，红旗翻滚，王太吉率领全团官兵在药王山下、石川河滨的古城耀县宣告起义了。

(三)

起义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收缴了全城所有的反动武装（胡景铨民团、雷天一保安团和公安局、县政府的枪枝），并收编了他们的部队。骑兵团正式改称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并将起义情况通电全国，争取各地响应。改编后的义勇军分为三路，每路分五个大队（内有一个特务大队），每一大队下设四个中队，中队下设四个区队。王太吉自任总司令兼三路总指挥，委雷天一为第一路总指挥。二路未编起来（后来准备把特务大队扩大为第二路）。

王振民在起义后，第二次去渭北苏区见了杜衡，并同他和取枪的赤卫队一起到了耀县。杜衡在耀县曹某家中，参加了由中共耀县县委书记张邦英主持的县委会议，讨论如何配合起义和建立耀县游击队等问题。事后，杜衡会见了王太吉。

义勇军司令部下令各级，报告收缴武器数字，给耀县游击队

补充长枪十九支，给渭北苏区赤卫军补充长枪二十一支。动员所部招募士兵，扩大队伍。王太吉召集全体官兵讲话，教育他们要忠实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并揭露蒋介石集团投降卖国的罪恶勾当。

义勇军成立了政治部(委任耀县卸任伪县长为政治部主任)，省委派赵宝珊及龚逢春、欧天东、秦重民同志去作政治工作，还吸收了几个文化界人士。杨声派王振民组成宣传队，把伪县政府及豪绅们的千余担粮食、财物分给了贫苦人民，同时召开了群众大会，镇压了几名罪大恶极的土劣；释放了监狱的全部犯人。

七天以后，王太吉率义勇军从耀县向三原进发，这时部队已达两千多人，骡马数百匹，电台一部，迫击炮两门。途经坡子堡时，王茂臣团匪曾在城上向我部射击，我军阵亡战士一名。王太吉令第一大队包围该堡，其余继续前进。下午适逢暴雨，部队行军困难，当晚便驻在三原武子苏区陵前一带，受到了苏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第二天，在陵前镇召开了军人联欢会，到会群众约两千多人，赵伯平书记、新子区委书记韩学礼同志参加会议，他们给部队送来鸡蛋、瓜果等慰劳品。会上，王太吉、杨声和群众代表都讲了话，大大鼓舞了抗日部队的革命士气。

第三天，晨起，吹号集合。王太吉怕“兵富不能作战”，乃下令将官兵所带财物，统交司令部收集保管，命部队向三原县城进发。约在上午十一时，军行三原县桥头镇辘轳把村，突与杨虎城部孙友仁的特务团发生激战。当时王太吉和杨声正在桥头镇东北里寨村小憩，被敌军两个连从右翼包围，幸得特务大队奋勇阻击，指挥机关及大行李，才得突围而出。由于指挥失当，遂致溃败。王太吉下令部队向耀县小丘镇背进，第一大队作后卫掩护全

军。当时士兵疲劳，情绪不高，且战且走，或逃或降（伪县长偷逃，第三大队队长张龙韬率部投降胡景铨民团）。骑兵团百余人行至淳化西原，被杨部赵玉亭一个团击溃损失大部，第四大队长周德民率部和敌军作战中全队大部覆没。黄昏时到达小丘镇，半小时后，敌又追至，第一大队四区队阻击片刻，力不能敌，遂向照金方向转移，去和习仲勋、李妙哉领导的游击队汇合，这支起义部队先后到达照金的约三百人②，当义勇军围攻张阁老崖寨子时，又遭孙友仁袭击，受到相当损失④。

过了不久，因三原、耀县一带敌情严重，不易活动，黄子祥所率的红四团和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所率的耀县游击队，均先后到达照金一带和义勇军配合行动，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苏区的陈家坡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指挥部，王太吉任指挥，高岗任政委，刘志丹（十月十四日脱险回来）任参谋长。下设参谋处、政治部，王伯栋负责参谋处，高岗兼政治部主任，组织、宣传两科由王振民、龚逢春分任科长。

王太吉起义前，原刘志丹所率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团约四百人，因杜衡坚持执行左倾路线，错误地指示该部进入渭华高塘原建立根据地，后又转到蓝田县张家坪，由于群众条件差，兼以地形不熟而招致失败。在王太吉起义之后，由南山潜回的干部如王世泰、康健民等十几位同志，均先后被派来义勇军中担任工作，领导力量有所加强，战斗能力大大提高。是年秋末冬初，指挥部所辖主力，智取漳河（旬邑县府所在地），奇袭甘肃省合水县，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杨虎城部孙友仁乘我主力出击，围攻照金苏区（薛家寨），经数日激战，薛家寨失陷，红军后方医院、修

械所等后勤机关遭敌破坏。习仲勋、张秀山、高景纯、吴岱峰、刘约三等率游击队及收集到的后勤人员百余人，先后找到主力部队与指挥部会合。随后，在甘肃省合水县毛家沟门战斗中，王太吉亲自率部队冲锋，将三倍于我之敌赵文治一个团击溃，缴获甚多，谭世麟一个骑兵营逃走。刘志丹、习仲勋、王世太、吴岱峰等同志都亲自参加指挥了这些战斗。

不久，习仲勋、吴岱峰、刘约三老同志去陕甘边境南梁地区开辟苏区，在那里成立了“中华苏维埃陕甘边区省苏维埃政府”（简称南梁政府），习仲勋任主席。吴岱峰负责军事学校。党派刘约三和王振民去建立保安（子丹县）游击队，开辟保安苏区。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在甘肃省合水县太白川之莲花寺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扩大为红三团，与原渭北游击队改编之红四团和少年先锋队共同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一支红军主力部队正式建成。王太吉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参谋长。

一九三四年春季，得到山东人民军刘桂堂（即刘黑七）率部一万多人已到豫陕边境的消息，党为了积极发展革命势力，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经红四十二师师委会决定，派王太吉去说服刘桂堂举义抗日，由刘志丹接任王太吉师长职务。王太吉于是化装进入白区，行经淳化通润镇，不料被旧日相识的马云从出卖（时为通润镇民团团长），被捕拘押。他在拘押时，著有《困顿漫语》一册，约万余言。现存有两首壮丽的诗篇，节录其一：“几经奋起几颠沛，愧无良策智量深，引颈辞世诚快事，瞑目庆祝红旗飞。”表现了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太吉又给父母亲信中说：“男决不学杜衡之被捕自首，遭社会人士唾骂及遣

父母羞。男革命目的在推翻国民党统治权，国民党杀男为意中事。”表达了宁愿为革命而死，决不向敌自首而生的钢铁意志。一九三四年旧正月中旬，敌人将太吉押送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审讯，敌人威逼利诱，他毫不屈服，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写了“崤函振鼓山河动，萧关频翻宇宙红”等革命诗句，充满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崇高的共产主义气节。太吉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从容就义，时年仅二十八岁。

解放后，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原军分区司令部在高陵县将马云从查获逮捕，送陕西省高等人民法院依法处决。

(四)

耀县起义是继清涧、渭华起义之后，在陕西省委领导下的一个骑兵团（约一千五百人）的起义。由于正确掌握了敌我力量 and 选择发动时机适当，以及组织工作周密、细致，因而起义获得完全成功。

王太吉领导的耀县起义是在陕甘革命处于低潮、红军主力在蓝田县张家坪失败、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之际，在起义过程中既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又不能取得和红军的配合，而王太吉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仍不畏艰险，以不屈不挠英勇果敢的精神毅然率部起义。这不仅乱了敌军阵营，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更重要的是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陕西省委在领导耀县起义前，曾指示中共耀县县委发动当地民团起义，组织农民武装，来配合这次行动。因此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新建立的耀县游击支队紧密配合，先后在城镇和农村建立革命组织，发动群众分粮斗争，镇压反革命分子，抗日义勇军并对红四团和耀县游击队在装备上予以补充，抗日义勇军胜利

到达三原县武子区时，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会和义勇军司令部，共同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军民情绪非常高涨，盛况空前。这大大地鼓舞了渭北苏区广大群众的革命精神。

陈家坡会议决定建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指挥部。王太吉任指挥。在王任指挥期间，曾率部智取张洪，攻克合水，在毛家沟门击溃敌军一个团等重大胜利，因而这支起义部队不仅是重建红军主力四十二师的主要力量，而且对创建扩大陕甘苏区，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耀县起义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是：

一、党派习仲勋、赵伯平同志在三原领导骑兵团一连四排地下党，进行了艰苦的宣传组织工作，王太吉起义时，党组织在其中起了积极作用。但党组织力量太弱。事实证明，起义部队如果没有坚强的党的基层力量，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当地革命武装的协助是很难取得完全胜利的。

二、改变军事行动计划是起义成功后失败的主要原因。原计划起义后去白水、澄城、黄龙山一带活动。因为过高地估计和依赖同盟军的力量，王太吉认为三原驻军杨竹荪团有一个营也能响应起义，遂改变北上为南下。这在行动方针上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因为敌在南面驻有重兵容易调动，且地势平坦对我军作战不利，辘轳把之败，就是明证。

辘轳把遭遇战的失败，主要是思想麻痹，缺乏侦察，情况不明，战术上又分散使用兵力，没有迅速下定决心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集中力量打击敌人，而只派小部兵力掩护撤退，以致失败。经验说明，起义部队首先是巩固部队，安定军心，迅速转移到安

全地带休整，不应轻易打无把握之仗。

三、对当时形势估计不足。骑兵团起义后不改称红军，而称义勇军，在政治上是为号召中间力量参加，但东北和西北的具体条件和群众抗日情绪究有区别（东北受日寇直接压迫，而西北未亲受其害），加以平时对部队政治教育不够，纪律松弛，没有形成核心力量，因而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

四、在用人上不重视政治品质，竟然叫伪县长担任政治部主任，尤其错误的是对雷天一民团先收缴其武器，后又全部发还，且委他为第一路总指挥，发给安家费二百元。雷借口出城扩大队伍，不听调遣，当义勇军撤出耀县后，雷即进城管押残杀分粮的贫苦人民，并枪伤我地下工作人员秦重民（中共党员），公开叛变。“西安事变”后，党利用灰色条件，将雷枪决于耀县中学，并缴收其民团武装。这一事实证明，起义部队对地主武装及其首领，必须提高警惕，在其未彻底改变之前，绝不能轻易相信使用。

“耀县起义”是在当时革命形势处于低潮，而由我党领导规模较大的一次起义，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它不仅震撼了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而且给陕甘两省人民留下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特别是这支起义部队在对敌斗争中，经过长期锻炼，为创建陕甘苏区和重建红二十六军，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一次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下旬骑兵团一连连长魏志坚（中共党员）率全连在陕西省商南县起义。魏因准备工作不周，地形不熟，警惕性不高，被本连反动班长蒲章成枪杀，起义失败。

一次是一九三二年冬，骑兵团二连连长刘清和（中共党员）